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 “回顾与展望——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6-04

[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中央美术学院

[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 中央美术学院

[摘要] 2000年9月22—24日,“回顾与展望——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与会代表包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江苏、湖北、广东、四川、重庆、陕西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70名,收到论文近40篇,会上24人宣读了论文。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

2000年9月22—24日,“回顾与展望——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与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与会代表包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江苏、湖北、广东、四川、重庆、陕西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70名,收到论文近40篇,会上24人宣读了论文。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雷喜宁,美术研究所所长邓福星,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副书记王宏建、副院长范迪安、教授金维诺、美术史系主任罗世平出席了开幕式。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薛永年近年来着力极深的课题,也是本次学术讨论会的缘起。对于百年学术的成就和特点,他做了精准的定位和详密、周备的陈述。他将中国的美术史研究划分为三大时期。1900-1949年是改步变古时期,大部分美术史家身兼画家与学者双重身份,涉足考古资料,提倡科学系统的方法。滕固和潘天寿代表了该时期在方法与价值观上的两种取向。1949年至文革结束是推陈出新的时期,编写出一批通史教材,对与民间工匠艺术密切相关的石窟、年画、版画等给予了空前的重视,个案、专史研究出现,开始进行方法的探讨。文革结束至今则是开拓进取时期,美术史研究开创了新局面,研究队伍扩大,对外交流加强,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断代史和专史、非主流美术、文人画、近现代美术史、鉴定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前所未有的。展望未来,他希望立足传统,迎接西方的挑战,注意学术自足,讲人文的同时不忽视图像。特别应注重国学传统,如文献考证、视觉感悟。对西方不应盲目追风,这样未来的美术史将进入新境界。他还认为美术史学将进入综合大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将更明确。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教授李树声的发言同样是通史性质的宏观叙述,旗帜鲜明地强调了二十世纪美术史学的发展与美术教育的紧密关系。他认为,如果不兴起美术教育,恐怕美术史学就不会提上日程。另外,画家很想解决自己怎么办的问题,这也是美术史学发展的一个推动力。解放后,阎丽川、李浴、王逊等人编撰的美术史教材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成就。这些教材都是为了供给学生学习使用,为了帮助美术家成长、帮助艺术院校培养全面的美术人材,因此把知识性放在第一位。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从另一个角度论及美术教育问题。他指出,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学最骄傲的成果是人材培养。他在回顾人材与培养机构的发展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研究,并特别指出美术史论人材所要求的素质、修养、学识:首先是现实性品格;其次是要有历史感,要有前瞻性和科学性。“历史感”问题由于切中时弊,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认同。在知识修养方面,邵大箴强调美术史学人材要兼备人文知识和美术专门知识两方面,并设想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最后,他分析了美术史人材的现有构成情况。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的发言着眼于对现行美术史论教学方式、体制与教材的思考。他认为现在的教学大量采用幻灯、电脑之类设备,但人文色彩不足,教员和学生之间缺乏交流;教学内容上不提倡价值探讨,并且排除了很多视觉因素和学科知识,缺乏稳固的知识性的培养目标。就教材而言,他认为,目前的教材缺乏深入思考,陈陈相因,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知识的更新要求教材补充近年成果,但成果本身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往往被忽略;整个学科建设框架的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反映在教材的编写上。由于美术史学研究人员中许多投身在教育第一线,因此对教材问题大家都很关注。水天中进而指出,这些问题同时也困扰着当代中国美术。缺乏人文关怀、缺乏人文价值,是阻碍中国美术理论发展的大问题。郎绍君很同意水天中的评价,他认为李公明的问题很中肯,希望各美术院校将其作为专门的理论问题来讨论。李公明发言中还提到,现行教材应用的语言很陈腐,如大一统、连续性、中原正统、进化论、文化沙文主义等仍留有阴影,而我们还未意识到这些问题。钟涵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原则上反对文化沙文主义是对的,但在目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殖民文化观、全盘西化观等也应警惕。李公明坚持认为,西方认为中国学者都是文化沙文主义,所以我们应格外注意。

钟涵进一步发问，究竟是文化沙文主义导致外国人的误解，还是当代的文化霸权主义导致的，或者是二者互动？李公明则怀疑，我们在反击别人的歪曲时，是否可以认为他们的歪曲就是根本的原因。钟涵在别处还提到，二十世纪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少人编写了大部头的教材、通史。这在第一时期是从西方的角度进行梳理，难免幼稚。第二时期是则有严重的机械唯物论，企图以教材统一思想。第三时期的教训也不少，如撰著匆忙、理论体系不健全、研究不充分等。此后，与会代表还从其它角度涉及到教材与教育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丰富内涵与现实意义还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利国呼吁拓展美术史论的视界。他从教学实践出发，认为应针对社会发展情况，加强美术设计史论、美术经济学和美术法、美术文化学、美术教育学、美术批评学等新兴课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会上，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学生就学习目的、学习条件、未来生存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或意见，他们的坦率、成熟和执著获得了与会代表的掌声鼓励，同时也促使大家反思。由于会议中多次触及教育、教材、教学等问题，这时倾听学生们的看法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作为美术史一分子的外国美术史，面前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外国美术史学者的发言充满了危机意识和责任感。李建群的论文概括了中国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历程。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镛将外国美术史的研究现状形容为“编译状态”。他认为，从资料搜集而言，永远不可能走出编译状态，但只有走出编译状态才能提高学术品格。首先要大量翻译，才有选择的余地。其次要加强方法论的研究，要借鉴西方学者的方法论，采用各国特有的文化学、哲学和美学方法，并加强交流和比较研究。此外，还应关注国外的现当代美术，开展专题研究，加强普及工作，努力争取实地考察。他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质，更新知识结构。大家纷纷对外国美术史研究者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绩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并对翻译工作寄予厚望。汤池特别提出，希望我国驻外使馆的文化参赞等官员能为搜集购买所驻国的文化艺术研究成果做出贡献。美研所研究员刘晓路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重点考察了芬诺罗萨、冈仓天心和太田西崖三人，尤其是对后者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太田西崖多次到中国，大量采用田野考古材料。他出版的著作中保存的图片资料数量可观，很多现在已经毁失。刘晓路回答代表的提问，谈到了冈仓天心和太田西崖的艺术观的区别，以及东京、京都大学学风的主要区别。出版物是研究成果的载体。炎黄艺术馆李松涛从近二十年出版的研究成果出发，探讨了左右美术史研究的社会因素、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与中国美术史的走向。他认为，地下考古发掘成果的发表、国内外资料的汇集与梳理是八九十年代出版情况的两大特点。在这二十年里，出版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以及《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专史、通史、个案研究、画派研究均有出版，部分出版物已具有经典意义。海外学人的译介工作、外国美术史的翻译工作也都在进行。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存在着的若干问题：尚存在空白点，如沦陷区美术和文革美术；史源未能充分挖掘；学风不够严谨和科学；撰写与出版形式不规范等等。对此刘晓路、陈履生、李福顺和薛永年作了补充。李松涛还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举办近百年美术史的展览，二是给优秀美术史论成果进行评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主编李维琨论述的是当代艺术史论的写作问题。他的观点是：一、当代艺术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范围应有相对独立的规定性，当以作品为主、相关文献为辅。二、当代艺术史论的写作应重视图像。三、世纪末大批当代中国艺术史论的出版物当中，存在着史论融合的趋势，他还分析了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常宁生发言说，国外对艺术史写作的语言问题非常重视，我们现在已意识到但还不够深入。对尹吉男提问当代中国美术史写作主要存在的问题，李维琨强调一大问题是对美术本身语言、构成、内在的组合在写作中着力不是很多。会上他还指出，美术史论的研究与出版并不同步，出版热不等于学术研究热，市场上的出版物也不能反映现有的研究深度。由于美术史学和考古学的视野部分重合，尤其是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因此双方的学者都格外关注对方的动向。会议特别邀请了考古学界的权威马世长、杨泓、信立祥、曹玮等人，以期互有助益。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李淞的着眼点在于考古学对美术史的影响以及中国美术史学的学科性。他认为，考古学对中国美术史的影响既体现在发掘成果上、也体现在方法上。陕西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玮详细介绍了该所近年来与美术相关的考古发掘情况。会上他还放映了130余张幻灯，到会者得以一睹大量尚未公开发表的珍贵图像资料，大饱眼福。作为考古学界的代表，他表示希望了解一些美术史学的方法，同时指出，每个学科应注意学习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这是基本素养。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将能共同受益、共同繁荣发展。从会议发言上看，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学确实还不尽成熟、完善，学科建设上还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对于学科规定性、方法、价值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大家的意见还很不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年美术史学仍旧是个新生儿。就学科命名而言，前些年“美术学”引发的争议还余波未息。这次会议上，广州美术学院黄专拟将中国美术文献研究的学科命名为“中国美术学”，也激起热烈的讨论。他认为美术学从属于历史学；水天中表示反对，并且认为艺术科学与美术学是不同的。曹意强、李淞和李军等也对美术史的命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尹吉男谈到，薛永年、李树声的发言涉及到一个相同点，即评价问题，他就评价美术史成就的标准是什么进行了提问。薛永年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作为准绳，一看美术史研究有没有抓住问题；二看有没有开拓新的方法、或是否很好地综合运用了方法。会上，很多学者本着严肃的态度，指出了二十世纪美术史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钟涵认为，前几

年机械唯物论、左倾政治路线支配了理论工作，严重干扰了本应有更大成绩的先进理论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工作出现重大发展，但在热闹的背后也产生浮躁空疏的现象。他特别提到80年代以来美术史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市场利益驱使人们小市民化；重视科学导致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文化失去了现代的人文关注，是美术史研究的败血症。郎绍君也提到，应对出现和存在过、存在的问题多加关注。他认为，50年代以来一体化的、主流的文化体制对教材、研究有何影响不必回避。朱青生认为，对编写通史内在的想法应该反省。美术史有两种，一是关于美术的历史，二是透过美术史来研究人类的历史。他的观点是美术史应通过形象来研究人和社会。薛永年在回答中强调美术史研究不能离开视觉文化去进行。他不反对把美术史作为工具，但这并未唯一的方式。朱青生进一步质疑道：我们可以对21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学进行回顾和展望吗？他提出，国人做史料时近乎苛刻地要求全面，原因在于我们要追随一种理性精神，摆脱过去意识形态的干扰。史料在中国美术史中常常值得怀疑，材料的缺损、大量的伪造……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史料是有局限性的，它未必可以信任，也未必一定能得出结论。他认为，教材艺术史的任务已经完成，应开始问题研究这样一个新阶段。他呼吁问题艺术史的时代，认为这是作为人文科学的有希望有前途的开始。范景中诙谐地评论道，中国的美术史队伍应进行“侵略”，扩展到各大院校，甚至扩展到欧美，这样美术史学就将走入一个新时代。总的看来，对于美术史学研究中应贯穿人文关怀，这一点与会代表没有异议；但美术史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定性与定位，大家有不同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着代沟。方法论问题近年来一直引人注目，它将直接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水平。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深刻地感到，传统史学中有很多东西可供美术史研究借鉴，并对目前有些人做史时对史料占有不够提出了批评。谭天则认为，不提出问题而进行研究是不可取的，对运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表示怀疑，并希望找出传统史学的不足。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皮道坚回顾了80-90年代这二十年中，史学方法论的突破对美术史研究产生的影响、对学科化进程所作的贡献。他认为，这一时期内美术史研究加快了步伐，学科臻于成熟，有两个标志：一是美术史学科的方法论的形成与自觉的应用；二是美术史进入综合性大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联系与受重视。另外，研究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他还谈到，方法本身隐含着文化权力与政治利益，我们反省的同时要警惕。沙文主义与大国主义是互为表里的；全球化会带来美好的前景，但是学术化中的全球化不应是一种方法对另一种方法的掩盖。对中国美术史方法论的状况，谭天持不同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国美术史方法没有重大突破，如鉴别真伪仍旧依赖经验主义的东西。其次，方法论有广义的与具体的之别，如果意识形态的、大的方法论没有改变，引进新的、具体的方法论就只是个人化的，可以质疑。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郎绍君着重谈了美术史中的“遮蔽”与“遗忘”问题。他谈到遮蔽可以被分为有意和无意的两种；遗忘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无意的遮蔽和被动的遗忘是美术史应该关注的问题。二十世纪中遮蔽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战争，此外还包括学术论争、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行为、市场与收藏等商业行为等等。至于遗忘现象，二十世纪很多现象在我们的很多文本和活动中被排斥掉了。此外，美术史还必须将学术视为美术史的根本，必须通过规范和有效的学术方法来接近真实和客观。对郎绍君的这篇论文，李军、李树声、邵大箴、李公明等代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应当看到，遮蔽与去除遮蔽既是一种现象，又隐含着方法上的意义。易英以亲身经历为例，讲述了当代美术史写作中的方法论问题。他把自己遭遇的困境描述为“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要把当代美术按时序写成历史，材料极其丰富，这就存在如何选择材料的问题。当代美术史编写过程中观点、方法、价值判断非常突出，这就导致了按照一种价值观、一种定义、一种固定的本质来编写当代美术史，排除其它因素的问题。历史主义是对本质主义内部的颠覆，历史主义的观念转为制度主义。当代美术史正处身悖论之中：没有本质主义就无法进行材料的清理；而没有制度主义又无法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对艺术作出反映。如何面对世界全球化的现实、进行美术史学科的建设，罗世平谈了他的看法。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异文化的比较凸显出来，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可比性，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建议首先应认定文化属性，从文化动力角度进行比较是一种可操作的方式。相应地，他极力号召投入力量进行对文化艺术的内在动力的研究。最后，他强调应加强理论建设。美术史的思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传统的方法；二是吸收其它学科的方法研究美术史发生背后的动力；三是学科本身的理论研究。皮道坚认为，把美术史发展的未来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它在新世纪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他期待青年学者关注美术史的具体研究与学科理论研究的关系，关注美术史的批评。南艺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常宁生谈的问题是“冲突与融合”。美术史学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是在西学东进的过程中出现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有的东西与其他文化不宜兼容。他着重探讨了西学在传入中国后对我们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东西文化的二元对立以及如何超越这种对立。此外，阮荣春、曹意强、单国强等也在会上宣读了论文。阮荣春认为中国画目前处于低谷，这与文人画理论的误导关系很大，对以石涛为代表的在野派文人画家批判不够。对刘曦林、林木、薛永年、刘晓路、刘骁纯、陈池瑜等代表纷纷发表了不同意见。曹意强是第30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他就该会的宗旨和此次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大会的情况作了介绍。单国强回顾了二十世纪对明代浙派的研究历程，试图从这个相当成功的个案研究中总结出可行的研究方法步骤。当前美术史研究中越来越注重个案、问题研究，这将是美术史学的发展方向，因此浙派研究无疑具有示范意义。会上任道斌倡议建立美术史学会，得到郎绍君等代表的赞同，希望藉此能够树立严格的

学科标准和自律风气。闭幕式上，范迪安具体谈到美术史学会筹备工作小组的情况，同时希望下一段成立中国美术评论学会。提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将结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次会议内容丰富，论及面广，高屋建瓴中不乏真知灼见，充满着良好的讨论交流氛围。希望这次会议能如薛永年所预期的那样，能促进美术史学界同人切实做好工作，从而成为中国美术史界历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mailto:leisun@firstlight.cn)

